

日本“当代中国地域研究”项目回望与思考*

苏于君

[内容提要] 2007年启动的“当代中国地域研究”项目，是日本开展中国研究的里程碑式研究项目，其不仅是迄今为止日本学界规模最大、联系最广的中国研究项目，还直接促成了日本各相关大学和研究机构正式成立了自己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使相关研究活动更加系统化、体系化。该项目具有跨学科、专业性、综合性的特点，是日本学界学科融合、跨学科联合研究的一次重要实践。这次实践体现出以下四个特点：其一，从微观角度对中国进行实证研究是日本学界的一大特色和优势；其二，日本的地域研究理论导向较为薄弱；其三，日本的地域研究广泛培养研究对象国出身的研究人员从事该国的研究工作来充实自己的学术研究力量；其四，日本的当代中国地域研究同时注重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这一实践对我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尤其是区域国别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当代中国史研究 区域国别学研究 日本中国学

在日本的区域国别学研究^①领域，中国研究一直是最受关注的内容之一。“日本中国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海外中国学中具有相当规模和影响力的学术现象。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越走越宽广，当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比以往更多地受到国际社会的瞩目。2007年，由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以下简称“NIHU”）^②牵头设立了名为“当代中国地域研究”^③的大型研究项目，将日本长期从事中国研究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新中国史研究青年项目“海外新中国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以日本为中心”的阶段性成果。

① 日文作“地域研究”，中文时而译作“区域研究”。《辞海》中无“区域研究”一词而有“地域研究法”，其释义为：“政治学中指以某个特定地域为研究对象，开展个案研究或比较研究的方法。注重在全面深入地了解该地域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分析该地域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的特色。”因此本论文直译为“地域研究”。

② “人间文化研究机构”网站：<https://www.nihu.jp/ja/about/outline>。该机构是日本文部科学省所管辖的“大学共同利用机关法人”里的下属机构。“大学共同利用机关法人”是依据日本《国立大学法人法》设立的不隶属于任何高等教育机关的独立法人组织。该机构旨在推进开拓新的学术前沿领域的大型研究项目，加强日本各研究机构突破学科领域壁垒，提高日本学术界的整体科研能力水平。此外，它还致力于全球范围内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跨学科和国界进行科研成果分享与传播。其由人间文化研究机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信息系统研究机构四部分组成，涵盖了当今所有科研领域。

③ 日语为“现代中国地域研究”。日语“现代”一词中文普遍译为“当代”，本文亦如是。特定机构名称本文不再另作翻译，仍使用日语“现代”一语。

的六大学术重镇组织到一起,开启了为期10年的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的跨学科合作研究模式。该项目是迄今为止日本学界规模最大、联系最广的中国研究项目^①,具有跨学科、专业性、综合性的特点,是日本开展区域国别学研究上的一次重要实践,也可以说是日本中国学乃至海外中国学发展中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重要事件之一。该项目的设立更是直接促成了日本各相关大学和研究机构正式成立了自己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改变了之前分散的、零散的中国学研究状况,使相关研究活动更加系统化、体系化。

我国学界先后有乔君的《日本的“当代中国研究”五年计划》^②、史艳玲的《从现代中国地区研究看日本中国研究的新动向》^③、董顺肇的《“现代中国地域研究”项目:日本构建中国研究的网络》^④和赵晓靓的《21世纪以来日本学术界的中国研究》^⑤对其进行了介绍、总结或评议。受刊发时间所限,以上研究或从该项目本身进行概述,或从该项目的某一角度展开探讨,而缺少对该项目的总体把握和对其实施形式、内容及其成果的深入探讨。鉴于该项目在日本中国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有必要对该项目的实施形式、内容及其成果特点作进一步的补充研究,以期填补既有研究之空白,并对整体把握日渐系统化、体系化的日本中国学研究大有裨益。特别是在当今学科融合与跨学科研究亟需不断深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中国学研究的这一新范式不仅能够为我国本土学者深化相关研究提供他者视角和经验借鉴,也对我国更好地深化海外中国学研究和区域国别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当代中国地域研究”项目的设立

1. 设立背景、目的

对于该项目的设立背景和目的,2007年公布于“人间文化研究机构”网站的《“当代中国地域研究”项目研究计划书(2007—2012年)》有如下表述:

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保持着长期的高速增长态势,国内生产总值逐渐赶超发达国家,使其在国际上的存在感不断增强。这一时期,中国全方位的积极外交政策和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也使其在亚洲乃至全球的影响力大幅提升。2005年爆发的大规模的反日游行所显现的存在于中日两国之间潜在的历史问题使日本早就存在的对“中国崛起”和“中国威胁论”的担忧愈加强烈。日本意识到,了解中国今后将面临哪些問題,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以及作为大国将采取何种外交政策,关系到未来日本的切身利益,也都是日本极为关切的问题所

① 参见赵晓靓:《21世纪以来日本学术界的中国研究》,《中国研究》,2020年第2期。

② 乔君:《日本的“当代中国研究”五年计划》,《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

③ 史艳玲:《从现代中国地区研究看日本中国研究的新动向》,《日本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

④ 董顺肇:《“现代中国地域研究”项目:日本构建中国研究的网络》,《未来与发展》,2017年第9期。

⑤ 赵晓靓:《21世纪以来日本学术界的中国研究》,《中国研究》,2020年第2期。

在。因此，在中国崛起的时代背景下，客观地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对维护东亚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基于日本多年来积累的“东洋学”研究的丰富成果，日本中国学研究水平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日本在1996—1998年实施的第一个研究当代中国的大型联合研究项目——“当代中国的结构变迁”也已过去近10年。该项目的研究体系和组织方式已远不足以观察和分析10年后发生巨大变革的中国。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亚洲，当代中国研究都展现出异常活跃的状态，日本也需要重建自己的中国学研究体系。鉴于中国的转型是长期的、史无前例的，因此亟须构建一个联合研究学术网，使各研究机构能够顺利开展合作研究，以提高日本的中国研究水平，并在全国范围内培养新一代的中国学研究人员。

作为中心基地的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也认为，“由于中国具有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因此在单一的学科背景下，仅从政治学、经济学等单学科角度研究当代中国，已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而应采取跨学科、综合的地域研究方法进行总体的当代中国地域研究。”^①

2004年，日本成立了旨在支持和促进日本各大学研究机构之间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交流的法律实体组织“人间文化研究机构”（NIHU），该机构也是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最大的科研组织。为配合当时的国际发展形势及日本本国政治外交的需要，2006年，人间文化研究机构开始实施名为“地域研究推进项目”的区域国别学研究，将伊斯兰地区、当代中国地区和当代印度地区定为首批联合研究项目。

2. 成员机构

“当代中国地域研究”项目于2007年启动，为期10年，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为2007年至2011年，共有六所科研机构参与，分别为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WICCS，中心基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京都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庆应义塾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东京大学全球中国研究基地、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中国环境问题研究基地（以下简称“中国环境问题研究基地”）和东洋文库现代中国研究资料室（见图1）。第二期为2012—2016年，在上述六所成员机构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所合作研究中心，即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法政大学中国基层政治研究所和神户大学现代中国研究基地（2013年8月加入，见图2）。

以上科研机构皆是长期以来关注并致力于中国研究，具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和高水平科研人员的代表性机构。这些研究机构在该领域中各有所长、优势互补，几乎涵盖了所有中国学研究领域。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在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和外交领域实力突出；京都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偏重历史视角的研究，涵盖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方面；庆应义塾大学现

^① 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网站，<https://www.waseda.jp/prj-wiccs/overview>（2023年4月17日）。



图 1 “当代中国地域研究”项目第一期成员机构组织图

资料来源：“当代中国地域研究”第 1 期项目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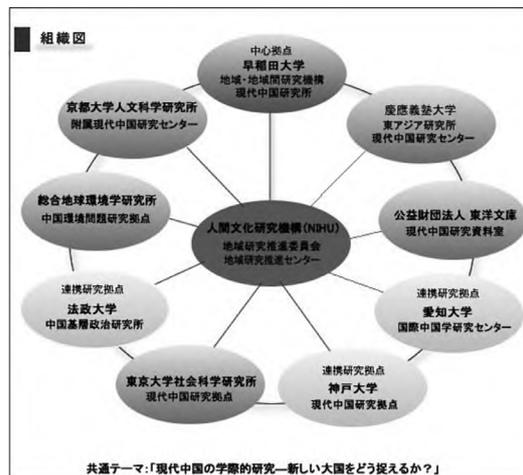


图 2 “当代中国地域研究”项目第二期成员机构组织图

资料来源：“人间文化研究机构”网站 <https://www.nihu.jp/ja/research/archive/areastudies/china>。(2025 年 3 月 11 日)

代中国研究中心主要致力于从历史视角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与外交，与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形成了研究专长互补；东京大学全球中国研究基地在研究当代中国经济领域研究力量雄厚；中国环境问题研究基地主要从自然现象和人类文化相结合的视角，分析相关数据资料，探索中国的经济开发给文化、社会及环境带来的影响；史料资源丰富的东洋文库现代中国研究资料室通过系统收集当代中国相关的文献资料，从史学的角度开展相关研究。

二、“当代中国地域研究”项目的实施

该项目的实施形式包括各成员机构定期开展的课题相关研讨会、每年一次的成员机构联合研讨会以及专项系列研讨会等，且不同的实施形式具有其相应的特点。

1. 各成员机构的子课题研究内容

表 1 为各成员机构参与“当代中国地域研究”项目两期中的立项子课题名称。通过横向对比可以看出，第一期主要聚焦于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第二期则更关注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关系。这种从局域到广域的研究视角，有利于对其研究对象——中国有更全面、更立体的认识和把握。而对于子课题名称进行纵向观察却发现，虽然第一期的子课题涵盖了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思想、环境等各个领域，但都较为宏观和分散，第二期的子课题体现出相较于第一期更加具体化且具有指向性的特点。这是由于该项目在实施初期（第一期）并未设定联合研究主题，而是由成员机构分别设定自己的研究子课题，因此研究内容较为分散，各个子课题之间也没有紧密关联。项目第二期设定了联合研究主题“当代中国的跨学科研

究：如何看待这个新的超级大国”，在该主题下由各成员机构设立自己的研究子课题，因此各个子课题既视角独立又具有关联性，不仅使研究内容之间较好地实现了有机统一，还有利于促进学科融合和跨学科联合研究。

表 1 “当代中国地域研究”项目成员机构子课题一览表

成员机构	第一期子课题	第二期子课题
早稻田大学 现代中国研究所	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	中国的“超级大国”化理论研究
京都大学 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人文学视角下当代中国的深层结构分析	中国近现当代史的多重结构
庆应义塾大学 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中国的政治治理	转型期的政治、外交与安全
东京大学 全球中国研究基地	中国经济的成长与稳定	中国和东亚的长期经济发展——工业化的轨迹与前景
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中国 环境问题研究基地	开发引起的文化、社会及环境变化	全球化中的中国环境问题与东亚成熟社会模式的探索
东洋文库 现代中国研究资料室	促进当代中国研究资料的收集利用与推进当代中国资料研究	日本现代中国资料信息与研究中心的构建：通过对资料长期系统地分析解析当代中国的变迁
爱知大学 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	无	关于中日关系变化的结构性变迁的实证研究
法政大学 中国基层政治研究所	无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社会学实证研究——中南海研究
神户大学 现代中国研究基地	无	关于中国经济体制可持续发展的实证研究：“跨越双重陷阱”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地域研究推进事业”网站 https://www.mext.go.jp/b_menu/shingi/gijyutu/gijyutu4/010/siryo/attach/1267664.htm（2023年4月11日）、“人间文化研究机构”网站 <https://www.nihu.jp/ja/research/archive/areastudies/china>（2023年4月11日）及各成员机构网站的相关资料整理而成。

各个成员机构开展子课题研究时，通常将子课题的研究领域细分成若干个课题组。以庆应义塾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为例，该中心在项目第一期围绕“中国的政治治理”这一子课题分为三个课题组。第一组的研究主题是“政治体制的过渡：一党执政体制转型的可能性”，该组以对中国共产党、全国人大为中心的立法机关以及以国务院为中心的行政机关的分析为首，对各机关的决策、党军关系、意识形态、中央和地方关系、少数民族问题、城市政治、农村政治等功能方面进行实证分析，探索中国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同时阐明中国政治治理的现状。第二组以“政治社会结构的历史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为研究主题，重新探讨中国政治史和中共党史，分析的对象和内容包括从历代王朝史（宏观历史）看当代史、统治体制和政治文化、农村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意识、农村和城市的革命比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比较、军事史、政治思想史等，多角度进行相关实证研究。第三组的研究主题是“围绕中国的东亚国际关系”，该组主要围绕当代中国的外交思想、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通过中日关系、中美关系、中韩半岛关系和台湾问题等的具体事例进行分析。除此之外，也研究中国在安全、区域主义、多边主义、资源问题以及贸易和投资战略方面的立场和实际行为等内容。

由此可以看出，该中心在项目第一期围绕“中国的政治治理”这一宏大的中心主题，通过现实视角、历史视角和国际视角对当代中国的政治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实证研究，不仅阐明了包括党政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民族问题、乡村治理等中国政治的现状，也探讨了中共党史、中国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中的系列问题，同时还对当代中国外交史、外交政策和多边国际关系等作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可以说是较为全面地完成了“中国的政治治理”这一子课题的研究。

庆应义塾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在项目第二期主要围绕“转型期的政治、外交与安全”这一子课题分为两个课题组。第一组的研究主题是“转型期的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研究的重点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如何维持或走向转型，并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如面对多元化的利益和价值观，爱国主义运动是否仍然是民族团结的有力工具等。该组使用一个普遍的概念框架，通过定性、定量分析，以结构化的方式阐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中央和地方政府）、市场（公司）和公民社会（各种团体、社区组织、大众传媒等）之间的关系和变化方向。第二组的研究主题是“转型期的外交与安全：权力的形成和使用”，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当代中国为追求国家利益和安全而使用的外部手段，主要指外交手段和军事力量。通过分析中国如何产生权力和使用这种“力量”，从经验和比较的角度进行实证研究，明晰中国对各种现有国际制度、规范和规则的态度，总结中国的外交观念和外交行为的特征，厘清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现实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使用其影响力的特点。

由于第二期的子课题“转型期的政治、外交与安全”更加具体地将研究时间段聚焦至转型期，因此庆应义塾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将研究对象聚焦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建设及外交政策上，更多地关注当代中国的政治动向，其研究成果也能更有利于转化成智库

报告为日本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方针建言献策。

2. 成员机构研讨会

举办小型研讨会是各成员机构开展相关研究工作的必要活动之一，其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举办形式多样的研讨会，且向全社会开放。诚如天儿慧在《当代日本中国研究（第一辑）》《创刊词》中所指出的，“当代中国地域研究”项目的其中一个基本目标是促进日本社会和普通国民对当代中国的理解，并以推动社会对当代中国的广泛理解为己任^①。成员机构所举办的各种形式的研讨会不只局限在学界之内，社会各界皆可参与其中。

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自2007年成立以来至2016年（全年），共举办或参与了139场^②相关研究会、研讨会、座谈会等。京都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除了举办国际研讨会，还以组为单位举办各自的研究报告会：石川研究班2007—2016年共举办155次研究报告会，村上班2012—2016年共举办73次研究报告会。^③此外，该中心自2012年起举办“中国当代史研究”中日共同研讨会，以“1950—1960年的中国”为题，至2016年共举办了五届，促进了中日相关学者的研究交流。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中心除了每年举办数次全体研究会和一次国际研讨会之外，2008年6月起开始利用午休时间（12:00—13:00）举办每月一次的“午餐讲座”。该午餐讲座邀请日本国内外相关专家作报告，探讨中国的当前问题和最新研究趋势，鼓励社会各界人士自带食物和饮品自由参会并积极参与讨论^④。东京大学全球中国研究基地2007—2016年间共举办了20场以上的研讨会、研究会或演讲会^⑤。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中国环境问题研究基地2007—2016年间共举办了五届中国环境问题国际研讨会和47届中国环境问题研究会。^⑥东洋文库现代中国研究资料室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研讨会、演讲会、史料研究会等共57次。^⑦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研讨会、座谈会等，中心所设政治外交研究班在2011年11月^⑧至2016年共举办各类研讨会等39次、经济环境研究班举办35次（其中中国农业问题研究会15次^⑨）、社会历史研究班举办37次（其中中日战争研究会

① 参见天儿慧：《创刊词》，《当代日本中国研究（第一辑）：历史·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页。

② 包含成员机构联合研讨会等。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网站，<https://www.waseda.jp/prj-wiccs/date/2009?cat=2>（2023年4月20日）。

③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网站，<https://www.zinbun.kyoto-u.ac.jp/~rcmcc/theme.htm>（2024年8月11日）。

④ 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网站，http://cccs.kieas.keio.ac.jp/activity/lunch_seminar.html（2024年8月11日）。

⑤ 东京大学全球中国研究基地网站，<https://web.iss.u-tokyo.ac.jp/kyoten/about/past/#2007>（2023年4月17日）。

⑥ 中国环境问题研究基地网站，<https://www.chikyu.ac.jp/rihn-china/research.html>（2023年4月17日）。

⑦ 财团法人东洋文库现代中国研究资料室网站，<http://www.tbcas.jp/ja/sympows.html>（2023年4月17日）。

⑧ 该中心于2011年11月正式加入NIHU“当代中国地域研究”项目。

⑨ 前11次研究会的题目是“中国农业土地问题研究会”，后14次研究会题目改为“中日农业问题研究会”。

26次,中日社会结构研究会10次),文化研究班举办20次^①。

其二,密切关注中国相关研究进展,邀请中国相关学者赴日做专题讲座。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举办“贫困与教育”研究会,邀请宁夏社会科学院教授马平在会上作题为《宁夏的回族与教育》的报告;邀请南京大学教授周晓虹围绕其编著的《中国中产阶级调查》^②一书开办研讨会;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文魁在研讨会上以《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状况和改革政策走向》为题作报告;邀请北京大学教授印红标作题为“文革群众运动的信息传播”的报告等。京都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特别公开讲演会和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午餐讲座,也经常邀请中国相关学者作报告。东京大学全球中国研究基地曾邀请北京大学教授牛大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钢明、江西财经大学教授温锐等做讲座。东洋文库现代中国研究资料室曾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武力、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济顺、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黄自进等作公开研讨会。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邀请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许敏、北京大学副教授余森杰等参加演讲会。

其三,注重培养年轻研究人员,中国籍留学生是其重要的新生研究力量。早稻田大学中国研究所2007—2016年共举办17次专门由年轻研究人员作报告的“次世代研究会”^③,其中仅2009年就举办了9次。此外还不定期举办“次世代国际研究大会”,如2010年1月举办的第三届次世代国际研究大会以“中日关系—历史、理论与方法”为主题,来自哈佛大学、剑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及早稻田大学的研究人员及研究生院学生在会上作了相关研究报告。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早在2005年就为鼓励该校研究生院学生积极开展研究活动而实施了“年轻研究人员研究资助”计划。2005—2021年该计划共资助了63项中国研究相关课题^④,其中中国留学生所主持的课题就有55项,占资助课题总数的87%。此外,该中心从2009年到2023年3月已举办了54届“青年研究会”^⑤。

3. 成员机构联合研讨会

举办联合研讨会是“当代中国地域研究”项目进行跨学科联合研究的重要方式。该项目在实施期间共举办了七届成员机构联合研讨会^⑥(见表2),其突出特点与重要作用如下。

第一,联合研讨会吸引了日本国内外中国学研究领域的众多人员参与,不仅成为该领域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进一步扩大了日本中国学的国际影响力。尤其是作为该项目最后一届的2015年度成员机构联合国际研讨会,有19所大学及研究机构参与,作报告者多达26人,

① ICCS 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网站, <https://iccs.aichi-u.ac.jp/research/activity/archive/> (2023年4月17日)。

② 周晓虹主编:《中国中产阶级调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③ 2008年1次,2009年9次,2011年5次,2012年2次。

④ 资助总金额高达1020.3万日元。

⑤ ICCS 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网站, <https://iccs.aichi-u.ac.jp/research/young-research/> (2024年8月11日)。

⑥ 据笔者查阅到的有效资料可知,从2008年到2013年,共举办六届联合研讨会,其中未查阅到2009年举办的第二届联合研讨会的相关资料。2016年2月举办的联合研讨会名为“2015年度当代中国地域研究项目国际研讨会”。因此暂推算为共举办七届联合研讨会。

规模皆为历届联合研讨会之最。由此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地域研究”项目在日本引发了新一波中国学研究的热潮，促进了海外中国学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发展。

第二，联合研讨会涉及分野范围广，是实现跨学科联合研究的重要载体，对相关学科的跨学科联合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如以环境为主题的第三届联合研讨会就指出，“环境问题不仅是技术问题，还因其源于社会本身而与中国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具有相同的结构”。该研讨会从历史、经济、政治和社会等不同角度分析其与环境的关系，探讨中国环境问题的现状与前景。第五届联合研讨会以时间为界，聚焦“胡锦涛时代的10年”，从政治与外交、历史与传统、经济与环境的视角对当代中国的发展特征进行了探讨，反映出在跨学科研究上的一些新尝试（见表2）。

表2 “当代中国地域研究”项目成员机构联合研讨会内容一览表

届别	时间	地点	主题	议题
第一届	2008.2	早稻田大学	当代中国研究的现状与前景	研究报告会：当代中国地域研究的现状
				国际研讨会：中国向何处去？——挑战与课题
第三届	2010.1	京都大学	环境问题—中国未来的可能性	中国环境问题的基础——过去与现在
				21世纪的中国经济与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的政治社会学
第四届	2011.1	庆应义塾大学	与崛起的中国共存	中国是如何实现增长的？——试问中国式的发展模式
				中国将经历什么样的转型？——试问政治体制转型的可能性
				如何与崛起的中国共存？
第五届	2012.1	早稻田大学	当代中国的困境——思考胡锦涛时代的10年	权力过渡与国家愿景
				汉字文化的现在
				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第六届	2013.12	京都大学	当代中国史——历史研究前沿	演讲会：1950年代的中国经济与中日关系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
第七届	2016.2	爱知大学	无	中国经济；中国历史；中国政治、国际关系、环境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所作。未查阅到第二届联合研究会和2014年度联合研究会的相关资料。

4. 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系列研讨会

2012 年 9 月, 由 NIHU “当代中国地域研究” 项目主办、朝日新闻和文部科学省协办的人间文化研究机构第 19 届公开演讲会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系列研讨会拉开序幕 (见表 3)。该系列研讨会围绕中日关系问题展开, 探讨如何在与美国合作、协作的同时与中国构建互惠、合作、协作的国家关系。该研讨会主张, “思考中日关系也就是思考日本外交的核心方向, 对中日关系的思考关乎如何描绘亚洲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的未来。构建理想的中日关系, 本身也就是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做出积极贡献。这种意识与姿态才是日本应当持有的外交理念”。

表 3 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系列研讨会情况

名称	时间	规模	会议主题	主要议题
京都大会	9 月 22 日	200 人	文化与女性	日本与中国: 应该互相学习什么? 怎样学习? ——从文化和女性的视角看
东京大会	9 月 30 日	450 人	政治、历史与安全	如何思考中日的历史节点? 如何开拓未来局面?
名古屋大会	10 月 5 日	350 人	中国经济 与经济交流	中国经济与中日相互依存的未来
福岡大会	10 月 27 日	100 人	地区、民间交流	在地区交流、民间交流上开拓新的关系

该系列研讨会不仅规模大、议题广, 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首先, 该研讨会分四场举行, 参会人员总数高达上千人, 以《朝日新闻》为首的日本主流媒体和地方媒体都对该系列研讨会作了报道, 可谓备受关注, 社会影响力广泛。在研讨会上发言或主要参与讨论的, 除了日本学界深耕多年、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学者^①, 还有与中国相关的社会各界代表, 如定居日本的中国籍作家和大学教授^②、在华日籍作家^③、从事中日贸易活动的企业代表^④、民间智库代表^⑤、

① 早稻田大学教授天儿慧, 政治学家五百旗头真, 早稻田大学副教授阿古智子, 东京大学教授丸川知雄、高原明生和松田康博, 爱知大学教授川井伸一, 神户大学副教授梶谷怀, 九州大学副教授堀井伸浩, 九州大学副教授益尾知佐子等。

② 女性作家杨逸, 神户国际大学教授毛丹青, 法政大学教授王敏, 早稻田大学教授刘杰, 爱知大学教授李春利等。

③ 青树明子。

④ 住友商事株式会社井上俊吾, 丰田汽车株式会社常勤监查役加藤雅大, 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山田升, 烟台龙荣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安田雅信, 从事日中间农业经营的加藤秀明等。

⑤ 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濑口清之, JETRO 亚洲研究所任哲, 富士通综研主席研究员柯刘, 福岡亚洲都市研究所研究员唐寅, 津上工作室的津上俊哉, 国际东亚研究中心理事长末吉兴一等。

国外大学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①和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②，等等。此外还有众多社会民众现场听会。其次，该系列研讨会的议题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社会、外交等众多领域，是“当代中国地域研究”项目中的又一次跨学科研究的尝试。与上述成员机构联合研讨会不同的是，该系列研讨会探讨的范围从学术领域延伸到了日常生活，很多社会各界代表在会上向与会者分享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感受，如从事中日农业经营的加藤秀明以“从一线看相互依存的中日经济”为题发言，曾任北九州市长、现任国际东亚研究中心理事长的末吉兴一围绕“从中日韩地区外交的经验所看到的挑战及相互发展的可能性：如何构建双赢的经济关系”作了基调演讲，釜山韩日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朴明钦也就“中日韩地区交流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性的发言。这些实践经验也给学界的当代中国研究提供了检验其成果的重要契机。最后，这场以学界为首、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国际研讨会的召开，也实现了NIHU“当代中国地域研究”项目的另一目的，即促进国际学界相关研究人员的跨学科合作研究，培养新一代当代中国研究人员，促进日本社会对当代中国的广泛理解，使研究成果回馈于社会。

三、“当代中国地域研究”项目成果及特点

历时十年之久、参与范围几乎涵盖了日本中国学研究领域八九成研究人员的“当代中国地域研究”项目，其成果也呈现出数量众多、形式多样等特点。此外，该项目设立之初所追求和倡导的跨学科联合研究这一形式在成果中又有何种体现？学科融合在该项目的成果中又达到了何种程度呢？笔者从成果形式，研究视角、领域与方法和成果内容及特点等方面，试图回答以上问题。

1. 成果形式

该项目成果除了包含研究人员出版的个人著作及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之外，大多以成员机构为单位统一出版研究系列丛书、研究报告论文集的方式呈现。然而这些成果多以日文发表，并不能为广大海外中国研究者所阅读。基于此，NIHU“当代中国地域研究”项目于2008年成立了《日本当代中国研究》编辑委员会，在六所成员机构的协助下选出当前一两年内公开发表的优秀论文及著作，组织人员将这些论文及著作的书评译成中文，以电子杂志的形式公开发行。NIHU与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为出版机构，2009年起开始出版中文系列研究年报《日本当代中国研究》，至2017年《日本当代中国研究》年报共出版了9卷。2013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收录了《日本当代中国研究》年报中的一部分优秀论文，在国内又出版发行了《当代日本中国研究》共6辑。

^①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副教授张大铭，加拿大菲沙河谷大学教授陆丁等。

^②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步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大慧，吉林大学教授沈海涛等。

除此之外，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还出版了日文研究丛书《超级大国中国的去向》^①共5辑和8辑《NIHU当代中国早稻田大学基地 WICCS 研究丛书》。2017年，又开办涵盖了当代东亚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英文版国际学术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udies》，由英国 Routledge 出版社公开全球发行，该期刊中刊发了为数众多的当代中国研究的相关论文。

京都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两个研究组在完成相应子课题后，以子课题题目为名称集结相应研究成果汇编成的研究报告论文集如下：《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当代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毛泽东人文学研究》《近代中国翻译概念的发展》《20世纪中国的社会体系》《长江流域社会的历史景观》《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制度重构》《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经济体制》。

庆应义塾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通过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出版了该中心的8辑《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包括高桥伸夫编著《救国、动员和秩序—转型期中国的政治与社会》（2010年）、添谷芳秀编著《现代中国外交六十年——变化与坚持》（2011年）、加茂具树等编著《今天的党国体制——转变中的社会和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2012年）、王雪萍编著《二战后的中日关系和廖承志——中国的知日派及对日政策》（2013年）、高桥伸夫编著《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手册》（2015年）、安田淳等编著《围绕台湾的安全保障》（2016年）、小岛华津子等编著《中国的公共性与国家权力——历史与现在》（2017年）、加茂具树编著《中国对外行动的来源》（2017年）。

东京大学全球中国研究基地自2008年起至今共出版了《当代中国研究基地研究丛书》共23辑^②。另据东京大学全球中国研究基地网站的成果一览表统计，在2007—2017年间^③，该基地共出版了相关中国研究书籍36本；2010—2016年间共发表论文62篇。

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中国环境问题研究基地自2007年至2017年共出版了通讯简报《天地人》30期，刊登该研究基地对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的实际情况和对策的研究结果。此外，2007—2017年间，以该基地之名共出版研究成果著作8部，出版该基地成员相关的个人著作24部。

东洋文库现代中国研究资料室主要以收集史料为主，共分为6个资料组，即“江南地域社会组”“图形图像资料组”“性别资料组”“政治史资料组”“1950年代资料组”及“其他组”。2010—2017年间共出版资料性图书21部。

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于2009年开始刊发《ICCS现代中国学杂志》，至2016年已刊发了16期。此外该中心还将其举办的各种研讨会、研究会的论文集结成册，整理成了内容

① 日文书名『超大国・中国のゆくえ1—5』。

② 至2006年共出版17辑。

③ 考虑到出版时间，故将统计时间延后。

详细、丰富的成果库。

以上这些研究丛书的出版、论文集的汇编以及研究期刊的发行等，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地域研究”项目学科融合的一个重要体现。

2. 研究视角、领域与方法

笔者对“当代中国地域研究”项目的相关成果进行了粗略统计^①，该项目的诸多成果在研究视角、研究领域及研究方法上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特点。

一是从研究视角来看，历史视角的研究所占比重偏大。高原明生在《日本当代中国研究2011》卷首语中就指出：“重视历史分析的视角进行研究正是日本的中国研究的一大特点。”高桥伸夫在《日本的中国政治、外交研究之现状》中也指出，“迄今为止，研究中国的日本学者们，主要依赖历史学的方法来分析现代中国。即以有限的文献为依据，对某种现象出现的经过进行详细剖析，从而说明现状”^②。经笔者统计，系列年报《日本当代中国研究》9卷中共刊载论文94篇、书评102篇，其中历史视角的论文38篇、书评34篇，皆占总数的三成以上。8辑《NIHU当代中国早稻田大学基地WICCS研究丛书》中，有6辑为历史视角；京都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8部研究报告论文集中共有论文113篇，皆为历史视角为主的分析；庆应义塾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8辑《当代中国研究丛书》中，历史视角的叙述占有7辑。

二是从研究领域来看，各成员机构的优势学科在成果中有明显体现。如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在研究中国外交方面成果所占比重大，8辑《NIHU当代中国早稻田大学基地WICCS研究丛书》中有3辑为外交领域；庆应义塾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偏重在中国政治与外交方面的研究，8辑《当代中国研究丛书》中有5辑为政治领域，3辑为外交领域；京都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在近代及当代中国文化及社会领域方面具有相当水平的研究力量，其研究成果的113篇论文中有69篇为社会文化领域；东京大学全球中国研究基地的优势学科为经济领域，23辑《当代中国研究基地研究丛书》中有21辑属于经济领域。

三是从研究方法来看，实证研究依然是日本当代中国研究的主流，从微观史角度开展实证研究是其最大特色和优势。正如天儿慧所指出的那样，“日本的中国研究长期以来以细致和扎实的研究风格广为人知。新一代的日本学者同样注重从某个地区的特定具体问题着手，通过细致的资料调查和现状分析，寻找出潜藏在中国社会深层的结构性问题，从而引导读者深入思考……日本学界长久以来具有注重调查分析研究区域的具体实际情况的优良传统”^③。回顾该项目的研究成果，最明显体现出此特点的是京都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8辑研究报告论文

① 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有些成果的全文无法收集到。

② 高桥伸夫：《日本的中国政治、外交研究之现状》，《当代日本中国研究（第五辑）：政治·对外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页。

③ 天儿慧：《创刊词》，《当代日本中国研究（第一辑）：历史·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3页。

集。该论文集所囊括的113篇论文中有102篇是分析具体事例的实证研究论文。

四是从学科融合的角度来看，跨学科联合研究的范式尚不够清晰。该项目成果在跨学科研究中的体现并不突出。首先，无论是系列年报《日本当代中国研究》所刊发的论文，还是京都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论文集的论文，几乎皆为独著论文。从不同学科角度对同一问题开展合作研究及分析的“跨学科研究论文”很是鲜见。而在成员机构所汇编的“研究丛书”中虽然可以看到跨学科联合研究的影子，但与积极、高效的学科融合还有一定距离。在该方面较为成功的代表性著作是关良基、向虎和吉川成美合著的《中国的森林再生：超越社会主义与市场主义》（2009年），该书从历史学、农学和经济学的视角对中国的“退耕还林”政策及其实施进行了历史性的考察，通过分析实地调查的具体事例，在解剖其社会经济构造的同时，论证了以政府为主着手实施的森林再生的可能性及其局限性。

3. 成果内容及特点

总体来看，由于该项目年限较长、参与者众多，因此收获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因篇幅所限，本论文主要以9卷系列年报《日本当代中国研究》中所刊发的论文为主，关注其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上的内容及其特点。这些论文皆为在业内公认的重要学术期刊发表的优秀且颇具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探讨这些成果内容及其特点，也可管窥该项目之目的、特点及其研究水平。

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方面，正如上述高原明生所言，日本学界多以历史分析的视角对某一具体问题展开详细探讨。山口信治的《朝鲜战争与中国的军工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军事工业建设计划（1949—1953）》^①一文，从中国的安全保障战略与军事建设计划的关系、中苏关系、中国政治体制的形成三个视点，实证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军事工业建设的构想、发展过程以及当时试图构建什么样的领导体制。从而得出三点结论：其一，由于受到朝鲜战争的影响，中国军事工业建设的构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当时国内社会状况及国际局势的影响下，中国采取的加紧实行国家工业化和计划经济、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是极为合理的。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比最初的计划提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考虑到了应对国家安全问题的一面。其二，中苏军事同盟在朝鲜战争时期迅速得以深化。其三，从当时的政治体制来看，无论参加朝鲜战争，还是此后加强军事工业建设和开展计划经济建设，都需要构建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八塚正晃的《文革后期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胎动》^②是以20世纪70年代前期围绕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变化和国内的政治动态之间的关系为主题的研究。该论文通过具体分析四三方案相关的一系列政治历程，阐明了文革后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形成过程及其具体状况。作者在论文中

① 参见山口信治：「朝鲜战争与中国的军工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军事工业建设计划（1949—1953）」，《日本当代中国研究2015》，东京：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NIHU）当代中国地区研究基地联合项目核心基地、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2015年。

② 参见八塚正晃：「文革后期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胎动」，《日本当代中国研究2016》，东京：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NIHU）当代中国地区研究基地联合项目核心基地、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2016年。

提出“为什么在 1971 年以后中国的对外环境发生了客观变化，而中国的对外开放还是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呢？”其观点是，中国已经从 1973 年开始作为工业化战略着手对外开放的基本路线，1978 年以后邓小平的经济政策继承了以上路线，在理论上将其正当化，推动了根本的改革。以上一系列政策，并非周恩来等政治领导人为了推进对外开放政策，有着周到细致的设想而实行的。这些政策应该看作是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寻求对外的“一条线”战略和国内的经济重建而实行的应对政策。从结果来看，这些政策可以评价为对外开放政策。在毛泽东的批准下推进对外开放的工业化战略，逐渐完善了对对外开放政策，以政府机构为中心，积累了经验，支持基础得以不断扩大。因此，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等人逮捕了四人帮不久，能够迅速推进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系化的对外开放路线。

諏访一幸在《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根源——基于人才保障措施视角》^①一文中，主要通过发展新党员的标准、选拔和任用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标准以及党员管理三个视角，总结了新中国成立 60 年以来发展党员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第一，入党方针政策同精英形象上经常产生隔离；第二，党的章程中所提出的发展党员的方针经常得不到贯彻执行；第三，改革开放时期，推动以“生产财富的高学历人员”为主要对象的入党工作这一党的方针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延续，且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方针的要求做到了贯彻执行；但长期以来作为支撑共产党作为阶级政党的农民及工人则逐渐被边缘化。第四，学生党员不断增加。其结论总结为，改革开放时期的入党政策及干部管理政策相比原有的政策总体来说较为顺利得以执行，确保党的优越性的制度建设也在不断推进；但党在非国家领域中的影响力和支配力相对减弱。

在当代中国经济研究方面，既有对经济政策的探讨，又有对经济现象的分析。松村史穗的《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粮食供应政策的演进过程》^②有如下三点主张：第一，20 世纪 50 年代粮食供应体制所起的作用，主要是为了配合工业建设，通过户口固化承担工业建设的非农业人口，进而进行有效的粮食供应。供应政策的目的是要消减城市粮食供应量，但并没有意图消减供应人口本身的数量。因此整个 50 年代后期，非农业人口的增加一直超过了商品粮供应能力的增长。第二，大跃进政策的失败和粮食危机发生以后，政府政策开始倾向于通过粮食供应与户籍制度一体化管理来消减非农业人口，造成了工业建设的后退。第三，粮食危机以后，政策方针体现出政府开始强烈地意识到非农业人口的规模和工业建设的进展必须与农业部门可提供商品粮的规模相适应。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也贯彻了 60 年代的方针，且这一时期工业建设的进展受制于商品粮的供应能力。

^① 参见諏访一幸：「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根源——基于人才保障措施视角」，《日本当代中国研究 2015》，东京：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NIHU）当代中国地区研究基地联合项目核心基地、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2015 年。

^② 参见松村史穗：「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粮食供应政策的演进过程」，《日本当代中国研究 2011》，东京：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NIHU）当代中国地区研究基地联合项目核心基地、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2011 年。

张馨元的《探析经纪人在中国玉米流通市场中的作用——以吉林省为例》^①以具体的农村地区为事例探讨了新的玉米流通渠道和作为非国有主体的经纪人的作用。该文总结了2004年以后玉米流通渠道在三方面的变化：第一，农户销售玉米方式的变化；第二，非国有粮食企业日益活跃，2004年以后的粮食流通市场中，国有粮食企业的支配地位开始动摇，大经纪人和加工企业的作用日益重要；第三，玉米价格形成体系的变化。该文分析得出，2004年以后供求状况成为玉米价格的决定性因素。农户通过在自身和企业之间加入小经纪人中介，不仅缓和了价格变动带来的风险，还间接达到了向居住地以外的国有粮食企业及加工企业出售玉米的目的。经纪人在流通市场中收集、出售玉米的行为有利于企业节约交易成本。最后该文指出，在中国粮食流通体制转向市场经济化的背景下，推动市场经济的力量不仅来源于政策因素，也存在于农村内部。玉米经纪人在2004年以前就已经活动在农村，2004年改革后，这些农村居民更大地发挥了中间商的作用，不仅提高了玉米流通渠道的效率，还解决了“卖粮难”问题。经纪人的经营活动对农户经营和企业经营两者都产生了有益作用这一事实在农业政策上意义重大。虽然有经纪人介入的流通渠道确实一定程度上联结了零散农户和大型流通、加工企业，但这种方式并不意味着农户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农户依然无法抵抗市场中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

在《从企业集团体制到产业集群的转换及区域性产业的发展趋势——以天津自行车产业为例》^②一文中，驹形哲哉主要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头十年天津的自行车产业的结构转变，也就是如何从一家国有企业集团的体制，转变为以一千家以上的民营企业之间分工为主，并带有开放性的产业集群的过程。这种急剧性结构转变有两个关键点：第一，在转型的过程中，不仅国有企业把各种资源释放给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集团及其下属的厂家还承担了在转型中所发生的巨大的社会性成本。第二，地方性行业协会在对引导区域的产业组织转变以及升级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加岛润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与地方财政结构的变动——省、直辖市、自治区财政的比较研究》^③在分析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社会主义财政制度和上海市财政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上，结合1949—1978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地方财政统计数据库的全国性比较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关于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社会主义财政税务制度，存在消减地方固有财源和中

① 参见张馨元：「探析经纪人在中国玉米流通市场中的作用——以吉林省为例」，《日本当代中国研究2012》，东京：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NIHU）当代中国地区研究基地联合项目核心基地、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2012年。

② 参见驹形哲哉：「从企业集团体制到产业集群的转换及区域性产业的发展趋势——以天津自行车产业为例」，《日本当代中国研究2012》，东京：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NIHU）当代中国地区研究基地联合项目核心基地、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2012年。

③ 参见加岛润：「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与地方财政结构的变动——省、直辖市、自治区财政的比较研究」，《日本当代中国研究2013》，东京：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NIHU）当代中国地区研究基地联合项目核心基地、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2013年。

央直接管理地方财政收支两个特点。其次，50年代形成的财政税务制度下的地方财政动态展现了如下特征：上海市财政收入结构转变为以企业收入为中心，特别是通过1956年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市政府和地方企业的关系更趋密切；1958年中央企业下放政策急剧提高了上海市的企业收入，同时也提高了中央上解支出，上海市的企业收入对中央财政直接作了很大贡献；1958年的变化在根本上决定了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上海市财政的基本结构。

在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方面，新保敦子的《现代中国英语教育和教育差距——关于少数民族地区英语必修化问题》^①一文，根据作者2005—2010年在上海市、宁夏回族自治区T县、甘肃省H县、云南省N县、辽宁省大连市、青海省H州及H地区进行的实地调查结果，探讨了城市和农村，以及少数民族地区之间英语教育的差距。该文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缺少教师，不能开设所需的英语课，导致英语教学难以顺利实施。而少数民族间的三种语言并用的教学方针也给少数民族地区的英语学习带来了很大障碍。纵观整个中国的英语教学，其特点是让有条件学英语的人受惠，从而扩大了民族间、地区间的英语教育差距，导致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换言之，英语教育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社会中的阶层差别。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三种语言并用的政策，难免招致少数民族放弃自己的民族语言，或由于得不到充分的英语指导而造成社会阶层差距加大的现象。

在当代中国社会研究方面，主要关注社会形态的变化和自然环境相关问题。平野悠一郎在《当代中国领导人的森林观》^②一文中指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过去的50多年里，一贯注重发挥森林的商品提供功能、保全功能和景观风土形成功能等，他们认识到大规模造林护林的必要性，并提倡进行造林护林。作为中国的一元化领导，为了给自身国家运营赋予正统性，他们当然必须重视保持稳定和提高百姓福利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面对已经劣化的森林环境，应该靠“人类的自力更生”来寻求改善，并维持和提升其商品提供功能和保全功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现在，一直持续实施造林护林的政策正是这种认识的体现。平野认为，当代中国领导人的森林观是在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下，正视森林过少状况这一自然生态背景的过程中，站在“如何维持、提高和调整森林的各种功能”这一“统治者”的立场而形成的，根据该立场而形成的“维持扩大森林”的认识，并不受特定的思想、意识形态所影响，相反却以一种将其内化的形式反映在当代中国实际的造林护林政策当中。领导人的这种森林观，并不能单纯用社会主义体制的自然破坏性来加以说明，同时也和苏联、东欧等地的特化成商品供给功能的简化构想划清了界限。

^① 参见新保敦子：「现代中国英语教育和教育差距——关于少数民族地区英语必修化问题」，《日本当代中国研究2012》，东京：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NIHU）当代中国地区研究基地联合项目核心基地、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2012年。

^② 参见平野悠一郎：「当代中国领导人的森林观」，《日本当代中国研究2010》，东京：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NIHU）当代中国地区研究基地联合项目核心基地、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2010年。

田原史起的《水利与社区——中国山东半岛 C 村的农田灌溉系统》^①通过作者在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县 C 村所做的详细田野调查，探讨了在水井及蓄水池等小型农地灌溉设施的建设、维护和管理上，行政村和村民小组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以及行政村和村民小组在农地灌溉上所具有的潜在可能性。

南裕子的《由村庄合并对中国农村“公”的思考》^②通过分析四川省大邑县、江苏省太仓市的实例，从“公”的三个层面对中国村庄合并进行了深入考察，总结出合并村“公”的性质的三个特点：第一，享受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服务的机会增大，意味着官方即“政治性质的公”向基层社会渗透；村庄合并成为政府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重要条件。第二，在官方“政治性质的公”不断加强的同时，“纠连公”也分化成更小的单位。第三，“公”的公平、公正这一层面，在合并村有可能成为现实。

园田茂人在《社会稳定与“有中国特色”差别社会的诞生》^③中，通过分析在天津实施的对我国四个社会阶层即中间阶层、劳动者阶层、农村出身学生阶层和农民工阶层的定点观测调查数据，证明了“差距拉大让人们产生不满情绪，导致社会不稳定”和“区域间人员流动大导致社会不稳定”这些论断的非准确性。其主张社会流动的提高不是单方面引起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严善平、魏祎的《中国大城市的阶层形成与代际间阶层移动的实证分析——基于 1997、2008 年天津市民调查》^④也以在天津所做的实地调查为基础，对我国大城市的阶层形成以及阶层移动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代际间的阶层移动，因出生年代不同移动的程度也不同。该论文指出，父母的学历和职业所代表的家庭影响对子女的学历产生了影响进而对子女的收入水平也产生了影响，并且其直接影响力不断增强；代表人力资本的学历的意义越来越重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代表政治资本的党员身份的重要性下降，在代际间阶层转移中的显著性已经消失；党员身份所发挥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收入、社会地位以及向社会上层移动等各方面都明显缩小；父辈的学历和职业所代表的家庭环境对子女的收入和地位形成的直接影响也是有限的，且有逐渐减弱的倾向。

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方面，增田雅之的《中国外交的“国际责任”——高涨的国际要求、

① 参见田原史起：「水利与社区——中国山东半岛 C 村的农田灌溉系统」，《日本当代中国研究 2010》，东京：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NIHU）当代中国地区研究基地联合项目核心基地、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2010 年。

② 参见南裕子：「由村庄合并对中国农村“公”的思考」，《日本当代中国研究 2013》，东京：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NIHU）当代中国地区研究基地联合项目核心基地、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2013 年。

③ 参见园田茂人：「社会稳定与“有中国特色”差别社会的诞生」，《日本当代中国研究 2013》，东京：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NIHU）当代中国地区研究基地联合项目核心基地、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2013 年。

④ 参见严善平、魏祎：「中国大城市的阶层形成与代际间阶层移动的实证分析——基于 1997、2008 年天津市民调查」，《日本当代中国研究 2015》，东京：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NIHU）当代中国地区研究基地联合项目核心基地、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2015 年。

慎重的自我认识、严峻的国际局势认识》^①一文指出，并非如陈志敏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只是在应对台湾问题、导弹防御系统等个别议题时谋求软均衡，从维护或获得中国的国际地位的观点看也在谋求软均衡。与其说这是中国领导层对中国崛起的自信表现，倒不如说是确认了领导层对国力及内外环境的慎重认识。正在崛起的中国的外交政策，已成为平衡高涨的国际要求、严峻的国际局势认识及慎重的自我认识这样一种难解的方程式的解。

金伯柱在《考察中朝同盟形成的动因——以1961年中朝同盟缔结过程为中心》^②一文中主张，中朝同盟条约是在中国希望划定国境线问题、稳定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必要性，以及在中苏对立中寻求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支持度必要性中形成的。中朝同盟条约是中国稳定与邻国关系的对外战略的一环，其动因是来源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政治力学，是中苏对立激化的影响，而并非针对敌对国的威胁。中朝同盟原本就是在冷战的逻辑之上加上中苏对立这个制约因素而形成的双重结构。

福田圆的《中法建交（1964年）与“一个中国”原则的形成——围绕“法华断交”与“唯一合法政府”的谈判》^③针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外交交涉过程，通过对比中国外交部的档案以及法国、美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外交档案发现，一个中国原则其实并非中国从过去以来不断强调的不变原则，而是在历次与国民党政府、相关国家之间的外交斗争中逐渐形成的；中国希望提升自身国际地位、推动中国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成为国际共识，并非外交突破二选一的问题，而是一种保持两者之间巧妙平衡、共同推动的做法。

张望的《“政治生存”与中日关系中的靖国神社问题》^④通过比较小泉和安倍两个时期的案例，否认了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争取对自民党右倾化政策的日本民众的支持”。张望认为，日本首相维系该政权的国内政治正当性，是影响日本在靖国问题上面对中国外压时决定让步与否过程中的重要因素。而维护国内政治正当性，是日本领导人的核心政治利益，即在选举中争取当选或连任。相比于个人、社会意识形态和外交战略的分析途径，“政治生存”的分析途径能够提供对日本不同外压对应的先后一致的解释，即对中国压力让步的不同国内政治成本，导致了日本在靖国问题上面对中国外压时的不同反应。

① 参见增田雅之：「中国外交的“国际责任”——高涨的国际要求、慎重的自我认识、严峻的国际局势认识」，『日本当代中国研究2011』，东京：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NIHU）当代中国地区研究基地联合项目核心基地、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2011年。

② 参见金伯柱：「考察中朝同盟形成的动因——以1961年中朝同盟缔结过程为中心」，『日本当代中国研究2011』，东京：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NIHU）当代中国地区研究基地联合项目核心基地、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2011年。

③ 参见福田圆：「中法建交（1964年）与“一个中国”原则的形成——围绕“法华断交”与“唯一合法政府”的谈判」，『日本当代中国研究2012』，东京：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NIHU）当代中国地区研究基地联合项目核心基地、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2012年。

④ 参见张望：「“政治生存”与中日关系中的靖国神社问题」，『日本当代中国研究2014』，东京：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NIHU）当代中国地区研究基地联合项目核心基地、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2014年。

在当代中国政治和经济研究方面，日本学界最关注的是政策的制定及其实施；而在文化和社会研究方面，则从现实存在的问题着手追溯根源之所在；在外交研究方面，又是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的结合。这些研究无不从细小且具体的主题入手，期待从“小”问题中探寻出“大”道理。这不仅反映了不同学科之间研究视角和方法的不同，也体现出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一大特色。

从以上研究中也不难看出，“当代中国地域研究”项目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既关注“现在”，也注重“过去”。他们希冀从过去的历史中找到与现在的连接，从而预知“未来”。日本的当代中国研究以历史的视角、实证的方法、详实的资料和严密的推理将当代中国的某一具体政策及其实施或某一社会现象等进行了问题化深加工，进而得出了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结论。这些结论不仅可以为国内学界提供方法借鉴，促使国内学者继续对相关问题进行思考与探讨，也进一步促进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不断深化与发展。但从跨学科研究角度来看，这些研究依然主要以单一的学科角度来分析某一问题或得出某种结论，跨学科联合研究的范式仍不够清晰。

四、总结与思考

从以上对 NIHU “当代中国地域研究”项目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日本的当代中国研究是一种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六个主要成员机构各有其优势学科，并在该领域推出众多研究成果。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和庆应义塾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优势学科集中在政治和外交领域，但也各有所侧重；京都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要集中在文化、社会领域；东京大学全球中国研究基地的当代中国研究逐步从旧有的优势学科政治、经济领域向外扩展；东洋文库现代中国研究资料室在历史、文化及史料研究方面优势明显；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中国环境问题研究基地属于应用型研究，与其他成员机构在学科融合方面尚未探索出新路径。

而地域研究作为日本学界研究他国的一种主流和通用的方法，其本质“首先是期待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把握。”^①但这种整体把握需要通过深入的跨学科联合研究才可真正实现。天儿慧曾在《区域研究的方法与现代中国研究》一文中指出：“区域研究的目的，旨在综合分析特定的对象区域，并进一步分别理解政治、经济、社会等现象……区域研究是以该地域的整体为对象的……必须形成综合性、理论性的方法论，将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

^① 平野健一郎：「グローバル化時代の地域研究」，西村成雄、田中仁編：『現代中国地域研究の新たな視園』，京都：世界思想社，2007年，第18頁。

文化人类学等都包容进去，并尝试以之进行分析。”^①因此，跨学科研究的水平越高，地域研究越能达到更深入更透彻的水准。

这项长达十年的中国研究项目也大致体现出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实证研究依然是日本地域研究的主流。在日本学界的中国学研究领域，从微观史角度对中国进行实证研究依然是其最大特色和优势。天儿慧曾指出，“日本学界长久以来具有注重调查分析研究区域的具体实际情况的优良传统”^②，日本相比于西方国家研究中国的一大优势和特点，主要是依靠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其与中国在使用汉字、文化及社会习惯方面存在许多共性，更容易进行此类研究^③。刘杰在《日本当代中国研究 2010》“卷首语”中也提到：“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的中国研究就有着非常坚实的调查、实证的传统。这个传统被年轻一代的中国研究者继承下来，依然是日本学者研究当代中国的基本特征。新一代研究当代中国的日本学者同样注重从某个地区的某个具体问题入手，通过细致的资料调查和现状分析，寻找出埋藏在中国社会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引导读者对当代中国社会展开客观、全面的思考，弥补着中国国内学者的某些不足。”^④

第二，日本的地域研究理论导向较为薄弱。天儿慧曾直白地指出：“日本的中国研究作为理论研究比较脆弱。”^⑤高桥伸夫在谈到日本的当代中国政治及外交研究时也一针见血地说：“日本学者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恐怕是方法论的问题……不以理论为基础却希冀从整体把握中国社会……日本学界的中国政治研究，具备以文献为基础的严密实证主义这一强项，但同时带来了缺乏理论及比较视点这一弱项。”^⑥针对这一问题，日本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学者也没有停止思考和探索。天儿慧曾坦言：“跨学科研究手法本身就是零散的，要把它们综合起来，使其相互关联，创造出某种框架，并进而作为理论提出是极为困难的……在如何利用其它区域的研究中也可同样使用的方法论进行研究这一点上，区域研究的方法论仍然极不充分，不得不说仍处于探索阶段。”他提出：“不应生硬套用起源于欧美的价值观、概念和分析方法分析亚洲的不同国家，必须在认识到围绕这些问题的各自的区域独特性的同时，分析、说明各种现象，起源于欧洲的‘普世’性概念本身也必须从不同地区的独特性角度加以相对化。”对于

① 天儿慧：「区域研究的方法与现代中国研究」，《日本当代中国研究 2017》，东京：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NIHU）当代中国地区研究基地联合项目核心基地、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2017年，第2页。

② 天儿慧：《创刊词》，《当代日本中国研究（第一辑）：历史·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页。

③ 天儿慧：「区域研究的方法与现代中国研究」，《日本当代中国研究 2017》，东京：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NIHU）当代中国地区研究基地联合项目核心基地、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2017年，第3页。

④ 刘杰：「卷首语」，《日本当代中国研究 2010》，东京：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NIHU）当代中国地区研究基地联合项目核心基地、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2010年，第3页。

⑤ 天儿慧：「区域研究的方法与现代中国研究」，《日本当代中国研究 2017》，东京：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NIHU）当代中国地区研究基地联合项目核心基地、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2017年，第3页。

⑥ 高桥伸夫：《日本的中国政治、外交研究之现状》，《当代日本中国研究（第五辑）：政治·对外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当代中国的地域研究，天儿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必要将中国所“固有的、独特性的、难以改变的”这些要素综合在一起，通过观察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性，找到作为有机集合体的中国的区域独特性即中国的基层结构。他更倡议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大力追求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权威迈克尔·奥克森伯格所指出的“找到流淌在中国最深处的本质部分。”^①若从NIHU的“当代中国地域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来看，其大部分论证结果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但在总体性的宏观视角中的确缺乏大的理论方向指导。因此，在跨学科联合研究中，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证研究也无法做到高效的学科融合，这也是影响地域研究进行深入学科融合的根本因素。

第三，日本的地域研究广泛培养研究对象国出身的研究人员从事对该国的研究工作来充实自己的学术研究力量。在NIHU的“当代中国地域研究”项目六大基地的成员里都有来自研究对象国——中国的研究人员，“包括已经在日本定居的学者、在中国有研究基地的学者，以及台湾、香港的学者”^②。日本借助研究对象国出身的研究人员的身份优势进行相关地域研究，对其总体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及成效起到了重要的加持作用。

第四，日本的当代中国地域研究同时注重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该项目以“促进日本社会和普通国民对当代中国的理解”为基本目标，组织了形式多样的研讨会，并鼓励学界以外的社会人士参加。这些活动有力地将学界与社会联系起来，成为信息互通、研究互助的重要渠道。

总体来看，NIHU的“当代中国地域研究”项目是当今时代国际竞争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也是跨学科联合研究的一次重要尝试。该项目的开展使其研究成果有效发挥了智库作用，成为日本政府制定及调整对华外交政策、宏观调控民间商业活动的重要参考和学术支撑。该项目的社会影响广泛，成为当时日本社会“中国观”的重要风向标。该项目的开展不仅扩大了日本中国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还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日本学界新一轮中国学研究的热潮，以及对跨学科研究的再思考。随着该项目的开展，日本大批新生代中国学研究力量迅速得以成长，特别是中国籍留学生成为其新生研究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中国学研究的转型与发展。

如今，日本对当代中国的地域研究也在持续加强和改进。2023年东京大学全球中国研究基地改组为“中国研究倡议”（“中国学イニシアティブ”，网站名称“中国学.com”），旨在以东京大学为中心，集结相关研究人员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探讨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并着力向外界传播日本研究中国的各项成果。可以预见，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将在国际学术界持续发挥着

① 天儿慧：「区域研究的方法与现代中国研究」，《日本当代中国研究2017》，东京：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NIHU）当代中国地区研究基地联合项目核心基地、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2017年，第3—5、3、6、3页。

② 高桥伸夫：《日本的中国政治、外交研究之现状》，《当代日本中国研究（第五辑）：政治·对外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页。

其特有的影响力。

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作为交叉学科类一级学科被正式纳入我国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成为蓬勃兴起的学科门类。加强区域国别学研究，是我国国家战略和时代发展的需求，也可以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撑。日本NIHU“当代中国地域研究”项目的实施对我国区域国别学的发展也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借鉴。

首先，应加强该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从区域、国别理论出发探索可以指导研究实践的理论体系，为区域国别学研究的学科融合保驾护航，也为我国对内对外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智力支持。

其次，研究课题的设定应与学科融合的现实需求相结合。区域国别学是综合性的跨学科研究，也是单一学科专门研究的集合体。在跨学科联合研究中，课题设定得越详细越容易实施，也能更有效地实现程度较高的学科融合。因此在区域国别学研究中也应注重实证研究和微观史研究，细处着手，以小见大，“找到流淌在‘此地’最深处的本质部分”。

再次，注重研讨会在跨学科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研讨会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实现跨学科联合研究的重要载体，对相关的跨学科联合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区域国别学研究中应避免学术研讨会形式化，而应积极开展实质化、效率化、多样化的研讨会，使之真正成为实现不同学科间思想碰撞和理论检验的平台。

最后，鼓励从事区域国别学研究的研究人员、研究对象国出身的研究人员积极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对象国出身的研究人员能够更容易从该地区的深层社会文化构造方面把握问题的实质，给他国研究者以更多借鉴。应当加强与研究对象国出身的研究人员之间的实质性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

苏于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焦长权）

An Analysis of the Theory of Private Property in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Cao Shengliang & Zhang Wenqiang

In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Marx revealed the subjective essence of private property. By proposing the concept of objective activity, Marx critically transcends Hegelian and Feuerbach's philosophies, thus paving the way for his philosophical transition later. By further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movement of private property, he captured that capital-labor relations lay at the center of the capitalist society initially. Marx further posited that communism was a positive subla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i.e., a practice to eliminate human alienation.

Review and Reflection of the Japanese Project *Network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Su Yujun

Network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launched in 2007, is a milestone research project on Chinese studies in Japan. It is the largest and widest connected project of this kind in Japan, in turns stimulating Japanese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es to set up their own center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This program emphasizes on micro-level empirical analysis instead of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featuring intensive interaction with Chinese researchers as well as creating positive social impact. Its interdisciplinary, professional, and comprehensive characteristics established it as an essential practice in Japanese academia, which also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our region studies.

The Birth and Advent of “Spectacle”: A Philosophical Examination of Guy Debord’s Theory of Spectacle

Liu Bingjing

Guy Debord's concept of *spectacle* goes beyond the visual image, advertisement, mass media, and the mode of commodity consumption they carry. *Spectacle* was originally a humanist concept of avant-garde art, which Debord borrowed from Bertolt Brecht's theater theory. By analyzing the consumer society, Debord discovered that the commodity economy was the real basis of the mechanism of *spectacle* influencing the masses. With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Debord developed *spectacle* into a philosophical concept of critical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nsumer society. This revealed the shift of capitalism from the production of material commodities to that of the subject, constituting a new mode of domination.